



二十一世紀臺灣聚落考古學的研究

李匡悌*

一、前言

因應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推動學門發展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黃應貴教授受計畫總主持人蕭高彥教授之邀，自2005年8月至2007年7月進行有關人類學門熱門及前瞻議題的調查。根據該執行團隊的共識，所謂的「熱門」及「前瞻」研究議題，前者指的是，「目前已有最多學者從事該議題的研究」，而後者指的則是，「目前還少有人從事該議題的研究，但未來有其發展性與重要性，而（且）很可能成為熱門議題者」。經該團隊的調查結果顯示，「聚落型態分析或聚落考古學」便是四項前瞻性議題中的一項。換句話說，這個曾經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所創導，並且在下半世紀，尤其在北美考古學領域的訓練裡，蔚為風潮的考古學取徑，在臺灣的考古學研究，仍舊看不到具體成果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個極具發展潛力的議題。

縱使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然過去，回顧世界各地的聚落考古學及其相關的研究，正如布魯斯·炊格爾（Bruce G. Trigger）在1967年的文章裡所說的，聚落考古學呈現的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在強化早期及現時的其他考古學研究，絕不是扮演取代的角色而發生的。當年的描述，在新世紀依然如是。近年來，有關聚落考古學研究發展的回顧論文，最具代表性的要屬畢爾門（Billman B. R.）和費蒙（Feinman G. M.）1999年編輯出版的論文集《在美洲的聚落型態研究：從維魯之後五十年》（*Settlement Pattern Studies in the Americas: Fifty Years Since Viru*）。除此之外，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沙布洛夫（Jeremy A. Sabloff）和艾旭摩爾（Wendy Ashmore）合寫，發表在費蒙（Feinman）和普萊斯（Price, B. J.）所編的《千禧年的考古學：一部史料》（*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 A Sourcebook*）論文集集中的第二章。雖然文章的題目〈晚近考古學的現況以及她在新千禧年的關連性〉（“An Aspect of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Archaeology's Recent Past and Its Relevance in the New Millennium”），似乎沒有明示與聚落考古學的關係，但字裡行間全然圍繞著這門方法論的內容著墨。這篇文章除了回顧聚落考古學在二十世紀的輝煌成果之外，非常清楚地爬梳了隨著這個議題和方法論所衍生出的不同研究途徑；其次，也提出了他們認為若干能夠在新千禧年考古學研究發揮影響作用的要點（Sabloff and Ashmore, 2001）。

本文的目的，希望再次回顧這門分支研究方法的發展，並列舉臺灣本地從事過的案例，拋磚引玉呼籲從事臺灣考古學研究的學者們在未來的工作上建立「從聚落型態出發，可以觸及社會結構、政治階序、宗教信仰、經濟關係、生業型態、空間分析和生態適應等層面」的重要課題的概念；準此，投入一定程度的關注。最重要的，透過聚落型態的研究和理解，才能夠有機會真正掌握臺灣史前文化內容的精髓。

二、聚落考古學研究的形成

聚落考古學的發迹，可分別從北美洲和英國兩個不同地區來說明。北美地區的說法，最早屬摩根（Morgan, L. H.）1881年在北美民族學集刊的一篇文章，探索那些原住民所遺留下來的房屋建築所反映的社會組織和結構。（Morgan, 1881）英國方面則以福克斯（Fox, C.）1922年發表他有關劍橋地區的考古學研究時，討論相異環境而發現不同類型聚落遺址的關係。（Fox, 1922）比較具體且影響深刻的，多半推崇文化生態學大師朱利安·史都華（Julian Steward）在美國西南部和大地盆（Great Basin）地區所完成的研究（Steward, 1937, 1938）：認為從房屋構築所在的地理位置的探討，透過聚落本身所具備的工藝技術的文化因素及社會組織的內容，作為觀察聚落文化模式形塑變異的基礎，其結論能夠理解成「文化」行為與環境互動下的產物。受到這種研究概念的啟蒙，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1953年在秘魯的維魯（Virus）河谷地區的研究，揭開了聚落型態考古學研究的序幕。在他《秘魯維魯河谷的史前聚落型態》一書的首頁，威利給聚落型態寫下了匠心獨具的曠世定義：

「聚落型態」亦即人類如何將他們自己在他們所居住的地形景觀上安置的方式。它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以及其它與社群生活有關的其他建築物的性質



與處理方式。這些聚落反映了自然環境、建造者所施用的技術水平，以及這個文化所擁有的各種社會互動與控制制度。因為聚落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廣泛保有的文化需要所直接形成的，他們提供了考古學文化的功能性解釋的一個策略性起點。

在威利的研究裡，遺址的類型 (site type) 和聚落的結構 (settlement configuration) 是兩個主要的觀念。基本上，遺址的類型是依遺址在功能上所表現的獨特性質來定義。一般而言，不同功能的遺址是不可能隨意地分布的。換言之，不同類型的遺址是因某些特定的因素使然而存在。所以，不同類型遺址之間的關係及遺址所處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可能在這些特定因素的條件下形成該地區特有的生業和聚落型態。

威利的研究同時將有關生態、民族學和考古學的資料合併處理。研究中一共調查了 300 多個遺址，並採集遺址上相關的陶片遺留。這項研究更是考古學史上首開利用航空照片作為調查輔助工具之創舉。研究材料整理過程中，將遺址依照推論上的功能分類，包括有：居住遺址、墓葬遺址、防禦性遺址，以及角錐形塔城遺址等。豐富的陶片類型足以讓威利能夠推斷部分遺址的佔居年代，得以把測得年代的遺址類型歸類成一系列社區型態。甚至於進一步嘗試界定衛星地區 (sustaining area) 以期推斷哪些村落是與儀式中心 (ceremonial center) 聯盟的；並藉由人口的多寡和社會政治組織來推論有關聚落型態的意義。這項研究証明了聚落型態分析在考古學研究上的揮灑空間；其次，相當具體地建立了將環境和社會因素對等看待的概念；此外，為了分析上的考量，必須將遺址當作較高層次的單位。研究的結果，相當成功地解釋了維魯河谷地區的史前聚落如何在不同的時代相互關連及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時至今日，這項研究仍被視為考古學研究的另一里程碑。

美洲大陸各地的考古學就此掀起了從事聚落型態的熱潮。這股風潮奠定了聚落型態考古學研究在美洲大陸考古學的基礎。相關領域整合型研究的概念也應運而生。意義相當深刻的，先有沃特 (Vogt, E. Z.) 強調讓考古學家、民族學家和地理學家聚集在一起，利用他們各自的專業來討論聚落型態中的共同問題 (Vogt, 1956)。不容忽略的，當屬張光直先生在 1958 年發表的〈新石器時代社會群體的研究：新大陸的案例〉(“Study of Neolithic Social Grouping: Examples from the New World”) 文中開導了涉及社會組織與聚落型

態之間關係研究的先河。在這研究之後，張光直更為聚落型態研究提供了另一項意義更加深遠的貢獻；那就是「週期性生業區域」(annual subsistence region) 的概念，認為在一地區內，一個群體的成員可能隨著季節的變化而有遷徙的活動，因此在這種季節性的生業活動過程中便產生不同類型的族群棲息聚點。

總的來說，聚落考古學基本的理論假設：考古遺留的空間型態表現來自於古代人類行為對空間利用的概念。透過現象和遺構作為主要的分析材料，觀察地理位置、區間(間隔)、面積大小、功能等有關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之間的關係。在此同時，個別的器物標本和生態遺留一起納入考量。由於強調對古代活動分布的瞭解，所有檢視和討論的資料必須是最原始堆積內涵的地理位置資料。在使用這方面的資料時必須注意到有關堆積層的脈絡，忠實確認擾亂現象的存在。檢視聚落型態時，考古學家必須掌握時間、空間，以及物質遺留的功能等不同的變異數；也必須檢視同時代、作用上相當的活動場所、構築和遺址。復原自然環境，其重要性歸因於社區分布及其分布的密度取決於地區內自然資料的豐富程度。人類行為的活動力與其自然環境密切相關，諸如：土壤的肥沃、動植物相的密度與變異。

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繁榮，同時成就了考古學研究的發展。對於古代物質遺留的興趣，更深入地希望了解其背後文化行為的意涵與脈絡。尤其是傳統上對找尋文化特徵的注意力，轉變為對文化變遷發生的原因及過程，積極地探討。研究設計上，以問題為中心，希望從考古材料的堆積與排列和組合，來發現反映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適應策略的規劃和營運。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工程興建，契約考古學(contract archaeology) 製造了更多發現古代遺址或遺存埋藏的機會。高科技的研發與應用，無論硬體、軟體或自然科學的實驗技術，包括電腦、全球衛星定位儀和全站儀(total station)，都助長了聚落型態研究的發展。

聚落型態的研究，在許多時候也以不同的命題呈現，如張光直先生 1988 年文章所歸納的，包括：聚落型態取徑(settlement pattern approach)、聚落考古學(settlement archaeology)、空間考古學(spatial archaeology)、空間或地理位置分析(spatial or locational analysis) 等。(張光直 1988: 75) 空間分析或空間考古學的方法是英國在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倡導的。基本上，考古學研究的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 可視為在空間結構和資料裡，尋求理論上具有



策略與規劃意義的聚落型態的一種過程。只要從聚落地理位置的探討，便能夠理解人類與環境互動所發生的行為表現。對不同的族群而言，選擇居住和活動的空間，所考慮到的若干背景條件和影響因素，或有差異，或有雷同。晚近以來，伴隨著尖端科學技術的創新，讓考古學資料的空間範圍相形擴大，資料亦快速累積。也在科技整合的研究模式氛圍下，提昇了對其他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認識，尤其是地理學。以至於 Ian Hodder 和 Clive Orton (1976) 兩位在他們的《考古學中的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一書中，述及三個在考古學研究裡必須從事空間分析的理由。第一個便是由於早先相關領域的研究旨趣相當侷限，方法上也沒有關鍵性，而且結論裡也沒有能增添比較詳細的說明和解釋。其次，許多論述只是透過主觀上的空間分布評估，這種作法非常不可靠。第三個理由是，許多需要用來處理較大量的空間分布資料的方法，已經開發完成足以提供研究上的需要。(Hodder and Orton 1976)

基本上，隨著研究視角的寬廣或細緻，聚落空間議題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層面。首先是單一構築遺留的研究。一般而言，透過房屋類型的研究，可以尋求不同社群之間的歷史傳承。甚且針對建築樣式和建構技術的瞭解，不難反映出這些社群對環境的適應，諸如傾斜的屋頂、門窗的開口大小和方向等；至於家庭結構的內涵亦可以由房屋大小和布局看出端倪。根據研究資料顯示，房屋格局和規模的一致性代表了社會原始性和經濟平等性的結構；愈是複雜的社會，建築物設計和功能性差異程度愈高 (Trigger, 1967)。第二層面為社區空間配置原則的探討：以一個同時性的聚落為單位，說明聚落內不同家戶進行各種不同活動的空間分布。有關聚落的地點和規模性往往是受生態環境所影響，但就聚落內不同地點的配置，許多情況與社會組織和結構關係密切。事實上，社會組織和結構的內容正是考古學研究希望能藉由各種空間的資料和器物及現象遺留，提供具體的說明和解釋。張光直先生在其 1958 年的一文中，便將聚落內的房屋配置分為四類：有計畫的、無計畫的、分組的、獨立家屋 (Chang, 1958; 張光直, 1988) 各種不同類型的組成，大體上除了社會組織和結構的影響因素外，生態環境、社會經濟、政治組織及宗教信仰等往往使得房屋的地理位置與家戶之間的關係上，產生一定程度分配模式。第三個層面以廣大地理區域為範圍，探討社區與社區之間地理分布的結構。基本上，在這個層面裡，不同聚落會因相異的需要，構成特定的

組織，諸如政治體、經濟體或宗教體，每一個體系之間不盡相同，規範亦因時而異。針對特定層次的研究，方法上都需要有不同的研究策略和理論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各種考古文化的重建，聚落型態所反映出的內容和意義，可以作為深入理解文化的關鍵。

三、聚落考古學在臺灣

查閱目前述及臺灣地區史前聚落型態或空間分析的著作，篇幅確實不多。論時間，當以張光直先生 1969 年《鳳鼻頭、大坌坑和臺灣史前史》一書為首。書中第四章龍山形成期文化的第二節便以「聚落型態與微環境」為標題，說明鳳鼻頭遺址上，不同時代聚落佔居的分布和內涵，其次也包括房屋構築的討論 (Chang, 1969 : 60-64)。之後，一直到了 1988 和 1989 兩年裡當時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的一位高有德先生，主持進行了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的計畫，第一年以《東埔第一鄰遺址：玉山國家公園早期人類聚落史的考古學研究 (一)》為題；第二年則以《荖濃河流域：玉山國家公園早期人類聚落史的考古學研究 (二)》為題。

隨著卑南遺址發掘資料的累積，連照美於 1991 年發表了〈臺灣東部新石器時代卑南聚落型態初探〉，以及 1995 年以英文發表《卑南聚落形態的若干看法》(*Some Aspects of Peinan Settlement Patterns*)。(連照美 1991, 1995, 2000, 2003a, 2003b) 除台東卑南的研究之外，陳瑪玲在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根據恆春半島的研究資料，分別發表有：〈鵝鑾鼻 III - IV 期文化相的聚落模式與系統〉(1999)；〈遺址內部空間分析：帆船石遺址〉(2002)；〈Saqacengalj 聚落形態與形貌：一個舊社的考古學研究〉(2005)。第三篇 2005 年發表的文章，另以英文寫作〈Settlement Patterns at Saqacengalj, A Slate House Settlement in Southern Taiwan〉發表在 *Asian Perspective* 的期刊上。2009 年何傳坤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館訊第 258 期發表〈臺灣中部地區史前聚落分布模式與古生態環境初探〉。此外，李匡悌於 2003 和 2004 年接受國科會專題計畫的經費補助，以「恆春半島史前石板屋聚落遺址的空間關係研究」為題，在恆春半島東部考察 14 處石板屋聚落遺址的地理位置、周遭自然與人文社會環境，以及聚落家屋構築的空間配置；研究中，針對四林格山石板屋聚落和萬里得山石板屋聚落，分別選擇兩戶家屋進行格局的清理、測繪和地表發掘。

恆春半島上所分布的石板屋遺址的文化內容和歷史意義被認為是銜接臺



灣南端歷史時期的接環。這項研究試圖蒐集恆春半島地區史前石板屋遺址聚落的空間所在與家屋結構的資料，來討論聚落與自然生態變異因素間的互動關係。最重要的，希望能更深入地認識這些石板屋聚落的文化表現、家屋建築結構工法和格局規劃的理念，以及聚落主人的生態適應模式。根據研究材料分析的結果，伴隨著民族學、建築學和地理學等調查資料的參考和佐證，有關恆春半島東部地區史前石板屋聚落的遺址，可以整理出下列若干具體的認識：

最早在 15 世紀初葉，最晚遲至 17 世紀，恆春半島東部地區史前石板屋聚落，能因其生態環境中是否包含海洋環境資源者，分歸兩種型態：亦即靠近海岸環境的聚落和完全佔居丘陵山地理環境者。雖然如此，鑒於地理位置的觀察，聚落位置的選擇似乎反映著以防禦性作用為優先的考量。此外，根據碳氧同位素分析的判讀，支持了這些石板屋聚落以山地適應為主的生業模式。石板屋的建築技術和材料使用，相當清楚地說明了這些社群對環境的依賴絕對不是採取暫時性居住的態度，當時至少具備了一定的彈性策略，以便應付任何突發性狀況所產生的變卦。建築技術和家屋布局的形式，一致性極高。無非是同一文化背景、社會規範和制度下的產物。本研究認為無論南仁山、四林格山或萬里得山的石板屋聚落，其格局和房屋空間規劃與千千岩助太郎分類中的排灣族北部型家屋最為類似。其次，恆春半島東部所使用砂岩石板厚重且面積大。如何選材、剝離和搬運的問題顯示，若非專業的技術人員，嚴謹的社會組織結構，管理制度和足夠的人力，否則整體聚落和屋舍的規劃和布局絕對無法能夠表現的如此整齊劃一。整體而言，確實不脫與排灣族群的密切關係，而且證據顯示，理論上或能把恆春半島東部地區史前石板屋聚落作為所有排灣族最早發迹的區域。（李匡悌 2010）

恆春半島石板屋遺址的研究嘗試以聚落形態的考古學研究，就社會組織、結構與關係議題，分別針對聚落單一構築、聚落內家屋空間配置，以及恆春半島東部地區聚落間關係的探索；亦即聚落型態考古學研究的最終目的。資料顯示，有關聚落考古學課程的訓練，臧振華先生曾經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講授「聚落考古學」課程；陳瑪玲亦在臺大人類學系分別講授：「考古學中的聚落與地景研究」（98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高年級及碩士班）和

「空間分析」(90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士班高年級及碩士班)課程。比較有趣的是，趙金勇因為博士論文研究東帝汶地區的關係，撰寫有〈東帝汶 Manatuto 地區聚落型態變遷之初探〉(2006)與〈東帝汶的防禦性聚落型態與聖嬰現象〉(2010)，類似的取徑也可以作為臺灣地區史前聚落課題研究的參考。

四、結語

依照黃應貴教授研究團隊的調查，「聚落型態」的考古學研究，長久以來一直沒有能夠在臺灣看到具體的成果。然而從整理獲得的資料，不難看出與北美地區聚落考古學稍成氣候的同時，張光直先生便將這個概念和方法引進臺灣。此後，也陸續地看到類似的研究。值得特別提起的，是李光周先生在 1977 年以墾丁遺址的考古材料進行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雖然論文題目是以遺址作為自然實驗室討論古代文化的內涵與意義，但整體旨趣明顯在探討考古遺留所反映的社會組織和結構。遺憾的是，目前臺灣所能看到的，多半屬零星在不同地區且有些不能稱得上成熟的研究。追根究柢，不得不承認，直到最近大部分的考古工作依舊將個別遺址的範圍界定及文化內涵的理解作為標的；並依舊針對代表性遺址的文化特徵作為找尋文化遺址在臺灣考古文化演化過程中的位置。對於聚落型態議題方面的探討，或許只能說想法總是大於作法吧！與臺灣考古學研究工作夥伴共勉。

參考書目

- Billman, B. R. and Feinman, G. M. (editors) 1999. *Settlement Pattern Studies in the Americas: Fifty Years Since Veru*.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 C.
- Chang, Kwang-chih
 1958. "Study of the Neolithic Social Grouping—Examples from the New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0 (1958), pp. 298-334.
 1962. "A Typology of Settlement and Community Patterns in Some Circumpolar Societies." *Arctic Anthropology* 1 (1962), pp. 28-41.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 in Anthropology, no. 7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rchaeology*. Modules in Anthropology 24.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Menlo Park, CA.
- Chen, Maa-ling. 2008. "Settlement Patterns at Saqacengal: A Slate House Settlement in Southern Taiwan." *Asian Perspective* 47 (2): 210-241.
- Fox, C. 1922.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ambridge Re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dder, I. and Orton, C. 1976. *Spatial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en, Chao-mei. 1995. "Some Aspects of Peinan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o.3 : 353-378.
- Morgan, L. H. 1881. *Houses and House 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 Contributions to North American Ethnology 4, U.S. Department of Interior, Washington, D.C.
- Sabloff, J. and Ashmore, W. 2001. "An Aspect of Archaeology's Recent Past and Its Relevance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 *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 A Sourcebook*, G. M. Feinman, and Price, D. eds., pp. 11-32.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 Steward, J. H.
1937. "Ecological Aspects of Southwestern Society," *Anthropos* 32: 87-104.
1938. *Basin-Plateau Aboriginal Sociopolitical Groups*, Bulletin 120,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D.C.
- Trigger, Bruce G. 1967. "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s and Promise." *American Antiquity* 32: 149-160.
- Vogt, Evon Z. 1956. "An Appraisal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New World," In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New World*, G. R. Willey, ed., pp. 173-182.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23.
- Willey, Gordon. 1953.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u Valley, Peru*, Bulletin 155,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3, p.1.
- 何傳坤。2009。〈臺灣中部地區史前聚落分佈模式與古生態環境初探〉，館訊第 258 期。
- 李匡悌。2010。〈傳承與斷裂：再看恆春半島史前石板屋遺址的聚落、家屋與人〉，「人類學門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會議論文，國科會人文處人類學門與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合辦，2010 年 10 月 2-3 日。
- 高有德、邱敏勇
1988。《東埔第一鄰遺址：玉山國家公園早期人類聚落史的考古學研究（一）》，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1989。《荖濃河流域：玉山國家公園早期人類聚落史的考古學研究（二）》，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 陳瑪玲
1999。〈鵝鑾鼻 III - IV 期文化相的聚落模式與系統〉。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54 : 63-96。
2002。〈遺址內部空間分析：船帆石遺址〉。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55 : 32-48。
2005。〈Saqacengalj 聚落形態與形貌：一個舊社的考古學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63 : 50-91。
- 連照美
1991。〈臺灣東部新石器時代卑南聚落型態初探〉，宋文薰等編《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上），頁 125-137，台北：正中書局。重刊於西安半坡博物館主編之《史前研究》，頁 623-636，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2003。"Some Aspects of Peinan Settlement Patterns"，刊於《臺灣新石器時代卑南研究論文集（Research Papers on Neolithic Peinan, Eastern Taiwan）》，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
- 張光直。1988。〈談聚落型態考古〉，《考古學專題六講》，頁 75-94，台北縣：稻鄉出版社。
- 趙金勇
2006。〈東帝汶 Manatuto 地區聚落型態變遷之初探〉，《2005 年臺灣考古工作會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主辦，2006.3.4。
2010。〈東帝汶的防禦性聚落型態與聖嬰現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周年所慶論文集《臺灣史前史專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